

# 突厥语研究

185212

## 通讯

9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编印

1983.3. 北京

# 突厥語研究

通訊

9

## 编 后

- 一、本期收集了1982年秋季来华访问的西德突厥学家A·冯·加班（或称葛玛丽）教授的讲学报告。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兴武、中央民族学院李增祥诸同志译成汉文。本刊暂无稿酬，凡转载或转译这些文章的刊物请与编者联系，并按规定致酬。
- 二、本刊自本期起改为铅印，字数及内容有所增加，欢迎会员及同行及时踊跃投稿。
- 三、来稿请誊写清楚，自留底稿。

## 目 录

1. 中世纪以来中亚的突厥文献……A、冯·加班 (1)
2. 回鹘绘画……A、冯·加班 (22)
3. 乌拉尔—阿尔泰学会的科学  
    研究活动……A、冯·加班 (45)
4. 编后…… (47)

# 中世纪以来中亚的突厥文献

A·冯·加班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世纪起（公元552年）就对突厥人的文化和历史有大量的描写。我们知道中国同事在这方面比我们西方人知道得多。但除此之外，考古学也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材料。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近百十年来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史料。考古发掘工作仍在向我们提供着新的资料，需要我们去作系统的整理。

## 塔里木盆地发现的手稿：

汉文：在整个塔里木盆地以及敦煌都发现有汉文手稿和刻版印刷文献，其中绝大多数为佛经，只有一部分为儒家和道家经典以及一般文书；

梵文：这是佛教语言，多半是些夹杂着外来词语的版本，以斜体婆罗米字母书写，发现较多。但伽罗斯底（Kharosthi）字母文本只在西南和南部有发现。文本古老，按照H.路德尔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历史和地理》以及《东土耳其斯坦的历史和地理续篇》（分别于1922年和1930年出版）二文中的意见，说明当时有少数印度人居住在这里。

吐火罗文：在库车发现的B方言为口头语言，A方言只用于佛经，二者均以斜体婆罗米字母书写，后者在吐鲁番发

现。

古和田文：一种中伊朗语，主要见于和田，敦煌也有发现，以斜体婆罗米字母书写，内容佛教和世俗都有。

粟特、波斯以及西北方言等中伊朗语文献发现于吐鲁番和敦煌，以福音文、摩尼和粟特字母书写。这些手稿均为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经文以及一些世俗内容。

𑖀𑖅𑖆𑖇语：亦为中伊朗语言，吐鲁番只发现七份手稿，与在犍陀罗发现的贵霜手稿书写法一样，世俗内容，已由O·汉森整理出版。

古叙利亚语：属闪语族，用福音文字母书写，只限波斯景教徒使用，内容多取自该教派经典《伯西托本圣经》，是在吐鲁番绿洲的布拉依克村发现的。

西夏文：只有吐鲁番发现少数刻本，多用 Qarahoto 字母书写。

契丹文：塔里木盆地未发现任何文本。

蒙文：吐鲁番发现少量自元朝以来的手稿和刻本，内容涉及佛教和世俗。

藏文：与蒙文本同期，多为佛经，发现于吐鲁番和敦煌。

古突厥文：在吐鲁番、哈密、敦煌、额济纳河和米兰发现部分回鹘手稿和刻本，其中只有少数用如尼克、粟特、婆罗米、汉文和福音文字母书写，有几种以摩尼字母书写，余多为回鹘字母。如尼克字母用于摩尼教和世俗内容，福音文用于基督教，粟特字母用于佛教，婆罗米字母用于佛教和世俗内容。汉文用于一些木刻版上为回鹘字和人名标音，涉及到的男、女为Mungsuz家中的人，Mungsuz本人是Tolui和忽必列的心腹和幕后军师（见

冯·加班撰《一份汉——回鹘文本版印刷文献》，威斯巴登，1976年；203—210页以及 H. 弗朗克的《中国回鹘家庭肖象》，加拿大蒙古学报，加拿大萨斯卡吞，1976，33—40页；摩尼文只限于摩尼教徒，回鹘字母无所不包。古突厥和回鹘文献收藏地：东、西柏林、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伦敦、巴黎、京都、北京和乌鲁木齐。

上述诸项提供了关于当时塔里木盆地和敦煌周围的人口、民族的线索。

### （兰）突厥时期

（兰）突厥王朝中心在蒙古，自八世纪（或稍早）以来以如尼文书写的碑铭已为人们所熟知。但这并非突厥人书写文化的开端：S.G. 克里亚斯托尔内和 V.A. 利弗西克译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的属于兰突厥时期书于公元 581 年的一墓志铭。见《布古特粟特碑铭》，修订版，匈亚利东方科学研究院，布达佩斯，1972年，第26卷第69—102页；L. 巴赞著《突厥人与粟特人：布古特（蒙古）墓志铭中的格言》(Turcs et Sogdiens; Les enseignements de l'inscription de Bugut Cmongolie)，混合语言学 (Mélanges linguistiques... Benvenists 巴黎，1975年，第37—45页)。虽然其内容涉及到突厥历史，但并非用古突厥文书写的，而是三面用粟特语、粟特字母写，另一面为梵文，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突厥书写文字以粟特字母是极令人吃惊的，很明显，粟特文是早期游牧突厥人书写和外交用语。

这些来自费尔干纳和萨玛尔罕的伊朗人没有在塔里木盆地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但对中亚文化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用。这一点可以从八世纪以来碑铭中所提到的高官显贵的头衔上看出。这些头衔来源于中部伊朗。它们的原型不会是萨珊王朝的头衔，而只能是用在有伊朗影响的乌浒(Oxus)地区、费尔干纳，或者甚至在贵霜王国。

正好我在《佛教在突厥的传播》(来比锡1954年，第161—173页)中所指出的，突厥佛教基本词汇不是梵文，而是粟特文。所以公元六世纪把佛教这一印度宗教带给突厥人的并不是印度人，而是伊朗人。稍后些时候，来自库车的吐火罗人成了他们的佛教大师，因为回鹘文本中的梵语词汇稍有向吐火罗语方向讹变的倾向。此后，汉地佛教对回鹘人日见重要。到后来在莫卧儿时期，起重要作用的则是西藏人。

兰突厥碑铭，用古突厥语写成，是要使死人复活，使其长生不死(见A.V.Gabain古突厥文碑铭的内容及其神奇的含义卷48第537—556页)。这些碑铭的风格并非取自粟特语，虽然其中充满着头韵和对句，但诗行工整。这应该说是口头流传的突厥文学——史诗和抒情诗——的痕迹。这些作品没有保留下来。

### 近期发表的著述：

S.J. 克里亚斯托尔内《金泉出土的石板——叶尼塞古如尼文碑铭时代》；突厥文献，1979，1—14页。S.G. 克里亚斯托尔内：《Terchinskaja nadpis》(predvaritel'naja publikacija)、苏联突厥学1980，P82—95。这是一份从changaj山发现的公元759年文本，有注音、俄译文、注释和复制原件，内容涉及到突厥民族。

O.F. Sertkaya；《关于兰突厥史的若干问题，噶欲谷



石碑合形成形容词组“Qiz Qoduz”》，突厥学 卷11，  
Louvain 1979，180—186页。

L. Bazin和J. Hamilton合著：《谈谈古突厥语中的Qiz Qoduz词组》，同上，第187—189页。

D. D. 瓦西列夫和D. M. 纳西洛夫著《阿巴坎古文献释读》  
(K Procteniju Abakanskogo Pamjatnika) 60—66页，  
一短文本，带注音，俄译文及注释。

D. D. 瓦西列夫：《西西伯利亚古突厥墓志铭》(Drevnetjurskaja epigrafiks Tuznoj Sibiri)卷 I。1977年突厥学资料汇编，莫斯科1981年，51—75页。包括注音，俄译文，注释、图片及影印件。

D. D. 瓦西列夫和Z. B. čadamba 著《Drevnetjurskije epigrafičeskija pamjatniki iz Doly r ujok》同上63—75页，附注音，俄译文，注释和复制原件。

### 摩尼文本

早期诗歌文献的证据是一些摩尼文赞美诗。这些诗已由 A. Von Le Coq 发表在《突厥摩尼文献 I》上并由 W. Bang 重新翻译成《摩尼赞美诗》，其中有些并非草译西方原著，其诗歌价值很高；见 A von Gabain：《突厥语文学基础》I，威斯巴登1964，232页；《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1、Abr，5卷，Leiden 1953，207—228页)。

从前人们曾怀疑摩尼教可能曾有修女庵。现已由一些手稿所澄清。是由黄文弼发现并以复制原件形式公布的，P. Ziéme 曾对此进行探讨《回鹘汗国摩尼教寺院回鹘文经济文

书》阿尔泰语研究，布达佩斯，1975，331—338页。最后由耿世民进行了翻译（关于摩尼寺庙一古回鹘文献，回鹘政府给摩尼寺庙的诏封）历史博物馆存，北京，考古学报，卷4，北京1978年，497—515页，带注音、汉译文，注释及词汇表。

### 其它著述：

P.Zieme《摩尼教回鹘文献》Berliner Turfan Texte V，东柏林1975年，90页，附56张复制原件，部分取自Xwastwanift。

### 基督教文献

吐鲁番的基督教徒可能主要是粟特人，因为基督教手稿主要是粟特文，回鹘文本有限。我们提请读者注意F.W.K. 缪勒（Müller）发表的《回鹘 I (Uigurica)》中关于魔术师看望圣童耶稣的事。这件事在原本福音书中找不到根据，所以可以理解为叙利亚传教士在突厥人中发现有拜火教徒。中国史家也曾提及突厥人中的拜火教徒。

P.Zieme在《回鹘文袄教婚礼祝辞》（突厥学及中亚学文集，A.V.Gabain zum 80. Geburtstag am 4.7.1981. dargebracht” 威斯巴登 1981.221—232 页。）中发现一些用 Estrangelo 字母书写的回鹘文稿是对一次婚礼的祝福。他为文稿注了音，进行了翻译，提供了注释，并发表了复制原件。

### 佛教文献

虽然支离破碎，回鹘文手稿和刻版印刷文献主要是佛

经。吐鲁番回鹘文献中的语言与兰突厥时期的碑铭用语大不相同，其中新的深刻宗教观念已发展出哲学和宗教思想。有些经文是逐字逐句的直译，但绝大部分只是按照一条总的思想，说明了突厥人对这些经文的理解程度。很明显，回鹘人并没有简单的固守古梵文或巴利文的佛经版本，他们一定熟知并参考了诸如吐火罗文、粟特文或汉文等译本。译经者似乎进行的是集体翻译工作，比较各种语言的不同文本，参考其中的教义、逻辑性以及行文风格。同时他们也一定考虑到了自己的物质文化特点。在这方面，看到回鹘人的思想发展到如此高度，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如果我们欣赏摩尼文诗歌，我们也应该欣赏佛经的行文风格，甚至那些带有头韵和尾韵的诗文。回鹘文的佛经语言已得到全面发展，已从简单的口语发展成优美的文学语言。

这里应提到的是《金光明经》中的一些例子。参见 S. Tekin《回鹘文金光明经意识篇》乌拉尔—阿尔泰学会威斯巴登1971，计119页，带注音、译文和注释；D. Maue和 K. Rohrborn《古突厥文金光明经(Caitiyastotra)篇》，Zeitsch, Deutsche Morg, Ges1979；威斯巴登282—320页，回鹘和藏文，附译文和词汇表，此稿梵文本已无存，回鹘版本较藏文本更为详细；P. Zieme《Vbtoroj glave sutry》，Zolotoj bleck，突厥学，列宁格勒1976年，第341—347页，取自《金光明经》，带注音，俄译文和注释。

黄文弼与另外来自吐鲁番的两位先生发现厚之的两套译自汉文的回鹘文玄奘传，后来带到北京，又带到巴黎，其中一部分已由A. 冯加班发表；J. P. C. Toalster《回鹘文玄奘传第四卷翻译和注释》1977，81及275页，耿世民《回鹘文

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 249—262页，有注音、中译文和脚注，L.Ju.吐古谢娃《回鹘文玄奘传片断》附注音、译文、注解和介绍，“Nauka”，莫斯科1980年，176页，内有图表141—172页。回鹘文译者僧古萨里（Singqu Säli）并没有简单地进行翻译，而是在译文中加进了艺术性。他把自己的话称之为Kavya，这是个梵文词，意为“加工过的散文”，其风格确实优美。对于我们关心中亚中世纪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这位十世纪（？）的译者不但了解汉文地名，而且能用回鹘文为原名注音。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塔里木盆地，阿富汗和犍陀罗地方的早期人口情况。

回鹘文学作品不仅供人阅读，有些还要背诵并排演。《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就是一证明（见冯加班《弥勒会见记》Beiheft I. II. 威斯巴登1957年，东柏林1961年；S. Tekin《Maytrismit, Buikanczlarin mekdfsi Ma itreyaile bulusma ipeidai dram》，Erzurum 1960；第16页，598页，附注者、突厥译文、词汇表；S. Tekin《Miatrimit nom bitig》Berliner p.9 Turfantexte Ix, 东柏林1980第360页；耿世民《古代回鹘古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第二幕研究，突厥学杂志第四期，剑桥—麻省1980年，附注音、译文、注释及影印原件。文本每章上首均注有“此幕在Badhari家中”，“本章地点在Keturmaci”、“本章地点在菩提瓦那”等等。很明显，在台后画有布景（见冯加班《有关吐鲁番出土的图画的说明》，印度研究文集，E. Waldschmidt纪念文集柏林1977年第105—118页，其中106页尤重要）。象古希腊戏剧一样，似乎戏院中也有“空间一

致”的做法。当叙述内容从一地改为另一地方时，叙述者并不简单继续独白下去，而是让一些“神人”（heavenly beings）从上面告诉人们新地点发生的事情。因为背景还是原来的那一幅，所以这样做是很必要的。与《弥勒会见记》一样，《本生经》的叙述（见F.W.K.Müller《Uigurica、Ⅲ》）也必然是由几个人一起进行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并非单纯自吐火罗文本译得的，其中的意思和语言等都有发挥。F.W.K.Müller翻译的《本生经》在某些汉译、藏译和和田语文本中找不到完全相同者、这可能是因为在回鹘人有意要使其语言文字戏剧化的结果。

回鹘人不仅了解佛教的基本著述，而且熟悉并翻译了古代著名大师的著作，有的甚至加了许多有名的注疏。（参见G.Hazai和G.Zieme在《柏林藏吐鲁番出土文献》第一卷中发表的《回鹘文金刚经残卷及傅大师的神歌》附补遗，柏林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东柏林1971年86页，内附40幅影印件。）这一研究文章翻译并解释了著名佛教经典《金刚经》的回鹘译本。该经于公元六世纪从梵文译成汉文。回鹘文本可能是九世纪在敦煌译成的。这部主张“四大皆空”（emptiness）的古经后来世亲以及法相宗所充实。其中的诗文是从汉文译得的，议论部分似为回鹘文本身的发挥，这是回鹘人创造性思想的例证。这部经一定为回鹘人所广泛知晓，因为已找到八种不同的抄本。

最近的一部抄本已由S.Tezcan在《Das Uigurische In-adi-sūtra》中译出（Berliner Turpāntexte Ⅲ，东柏林1974年，共76页，附69张影印件，有注音、译文、注释和词汇表）。这个文本是在佛教受到伊斯兰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压

制时成书的。原小乘经文可能出自元代，其抄本时间为十七或十八世纪。附录中有赞颂弥勒的诗文。

大众部佛教带来的是些较肤浅或神秘的经文，但也有些虔诚的故事。P.伯希和曾发表过的《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o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ion ouigure》（善恶两王子）现由J.R.Hamilton（汉密尔顿）再次发表（巴黎1971，共159页，附82幅影印件）。这一研究工作所依赖的是两种文本，应早于十一世纪。

来自大乘佛教的还有经常遇到的“二忍”的思想（见K. Röhrborn《回鹘文超度亡灵的祷词》），Berliener Turpan-texte I，东柏林1971，共64页，64张影印件，附有注音、译文及注释，文本名为Kšanti qilvuluq nom。

很明显，吐鲁番人喜欢背诵或传抄《忍论》，这不是对罪过的简单忏悔，在这些忏悔祈祷中不但要历数已知罪过，甚至前世或他人所为。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积累功德，而且这种阴德还可转给其它人甚至死者。在葬礼以及特定的祭奠日要为死去的亲人念或长或短的经文，这些祭奠以七天为期，人死后，有若干个七天。“七天”为一周，但中世纪的中亚人并不以星期记日。不知是否为故去者所念的经，其中所提及的‘周’是否来自西方，因波斯景教影响所致。上述“忍论”的后续部分已由I. Warnke整理出来，见《Eine buddhistische Lehrschrift（一份佛教的忏悔书——西北道场占法回鹘文本残部）》

与此有关的研究论文是J.P. Laut的《佛教地狱观在古突厥文献中的特殊含义》（Marburg, 1980，计133页）以及冯加班《中亚的地藏菩萨崇拜》，（1971，威斯巴登1973，P47—71

页)这一研究论文翻译了回鹘文本及其附图,部分根据回鹘画家,部分根据汉地画家,日本学者Togushi和Ogawa出版的敦煌发现的四部汉文本手稿。其中有简朴无色的素描画,并且完全与本文本相吻合。收藏在西柏林的回鹘文本的回鹘绘画有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一张穿着尼姑袈裟的地藏菩萨象,头带白罩。这种面罩云岗石窟中拜佛的尼姑头上也有,这在汉地和吐鲁番都不常见,这是否也是西方(文化)成分呢?

元朝时期密宗为西藏人所重视,同时也传到吐鲁番的佛教中。见G.Kara和Zieme《回鹘文密宗译本残部》Berliner Turfan texte VII,东柏林,1976年,共112页,内有49幅影印件)。该文重新翻译解释了F.W.K.Müller 1928年的《Zauberritual》作者为《转抱王曼荼罗》(Cakrasamvara—mandala)找到34份残片。这个文本是由一位叫Punyasri的回鹘学者从藏文翻译的。上面增加一些密宗经文,作者认为是公元十四世纪写成的。

上述两作者还发表了《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s Guruyogas "Tiefer Weg" Vonsa-Skya Pandita, un der Manjusri na masamgiti》,(东柏林1977,共148页,附50幅影印件)。前一文本(Guruyogas)谈及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于元代译自藏文本。研究所依靠的是一部单一手稿。第二部经涉及到文殊菩萨,以三种译本为据。原版本据认为是很古老的本子,可能成于五世纪。汉文、藏文、蒙文和满文均有译本。

另外还有P.Zieme和G.Kara的《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敦煌四部藏文经书回鹘文译本中的Naropao说》

(布达佩斯1978年,共347页;附有影印件表)。回鹘译者为哈密的Arya Acara,回鹘文抄本是由吐鲁番绿洲的三柳中(La-ükcüng)地方的萨里都统(Sari Tutung)于1350年书就。

继Fujieda K.(京都,1957)之后,K.Rohrborn和O.Sertkaya重新解释了北京西北六十公里处居庸关漂亮的大型拱门上回鹘文碑文(见卷130,威斯巴登1980年《居庸关拱门上的回鹘文碑文》304—339页)、编著者称这些佛经诗文中的语言为“教职人员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与当地1343至1345年间的语言不符。突厥语诗文与汉文、蒙文、梵文及藏文四种内容不一致,是一份单独的文学著作,带有首韵和一些尾韵。出版的论文中有注音、译文和注释。

还有一部从藏文译至回鹘文的稿本。该稿本为京都Ryoku大学所收藏。现又由Juten Oda加了解释(见《回鹘文佛教经书片断》,突厥学杂志,卷19,伊斯坦布尔1980,183—202页,附三张表格)。译者僧伽室利生活在元代。编者为藏文和回鹘文本注了音,译成土耳其文并附一词汇表。

据我们所知,日本有不折仲村(Fusetsu Nakamura)收藏的一批回鹘文手稿。Shogaito Masahiro有一篇研究文章《仲村藏书所见回鹘文片断研究》(Toyo Gakuho卷61—29页,1979)。作者翻译解释了两部手稿和一份刻版印刷稿,其中包括Ksamayati的《Säkiz yükmäk yarug》以及《Sitatapatra-dharan》。研究者为两文注了音、译成日文并加了注释。Kudala Kōgi曾对京都Ryokoku图书馆的Otoni藏本的一些手稿进行翻译解释:《关经(Guan Jing),一观无量寿经》回鹘文片断评注》(佛学,京都RyūRoRu大学,卷35,33—55页)。原文为汉译本,现加了日文译文、注



音和注释，附两份表格。

### 近期其他著作：

H. Halen: 《Die uigurischen Mannerheim Fragmente (1) 》, 《回鹘文曼纳尔海姆残卷(1) 》, 赫尔辛基1979年, 东方学研究芬兰东方学会编, 51:4, 9页, 附7张图片。手稿得自吐鲁番, 现存赫尔辛基;

D. Maue和K. Röhrborn: 《ein zweisprachiges Fragment aus Turfan 》, (吐鲁番出土的对照文献残卷), 中亚杂志卷20, 威斯巴登1976, 208—221页;

L. Ju. Tuguseva《古突厥语手稿的结构》(O strukture Drevneujgurskich teksto 》) 突厥学文献汇编1977, 265—284页;

Oda Juton《uiguru bun-nu Monjushiri Jojyu hono danpan ichiyo 》, Toyō Gakuho卷33, 1981, 86—109页;

Shogaito Masahiro: 《回鹘文手稿8212—109号 》, Toyo Gakuho卷54, 044—057页; 这份原稿时间为1350年, 从藏文译成回鹘文;

同上作者: 《An uighur aradana to Avalokiteśvara Sūtra 》, Toyo Gakuho, 卷58, 1976, 01—037页;

同上作者: 《斯坦因(Stein)藏本回鹘文手稿第8212—108号 》, Toyo Gakuho, 卷57; P017—034, 第一篇原为回鹘文, 称为《Tözin uqittači Nom 》, 第二篇列出了佛教各宗派。

同上作者: 《关于“阿含经”的一份回鹘手稿 》, 神户外大论丛, 卷31 1—22页, 1980年;